



说真话,写出来

◆ 朱大建

上海是现实题材纪实文学的重镇,上世纪三十年代,夏衍写出传世之作《包身工》。改革开放后,黄宗英发表名篇《小木屋》。因为种种原因,现实题材纪实文学,在新世纪前后遭遇了一些新挑战新问题,写作者青黄不接,也缺少发表作品的平台。

2015年春,上海市作协创办了《上海纪实》电子期刊,“追求真实性、思想性、文学性三性统一与融合”。有了这个平台后,纪实文学创作队伍开始聚集,以老、中年作者为主,年轻作者的面孔也不时亮相。五年时间,不间断地在线出版了20期,累计刊出390余篇400多万字的原创纪实作品,刊发了众多当代著名作家的新作,接续了上

海纪实文学创作的丰厚传统,同时还培育了上海一批有志于纪实写作的新生力量。作为办刊五年的回顾和检阅,《上海纪实》电子刊举办“永业杯”现实题材纪实文学大赛,关于大赛的报道已经很多,我不再介绍,只想说说我感受到的现实题材纪实文学创作中面临的两个问题或者说瓶颈。

首先,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不妨以我最近写的《钟鸣医生的武汉75天救治之旅》为例。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钟鸣,庚子年小年夜,被国家卫健委紧急召到武汉救治危重症病人最多的金银潭医院,他在南6楼ICU任医疗组长。当日武汉宣布封城。此时,是新冠肺

炎疫情早期,他看见的是:惨烈!

“那天中午,钟鸣第一次走进南6楼医生办公室,房间里挂着一台大电视屏幕,可以看到ICU重症监护室里所有的情况。钟鸣一看惊呆了:满屏幕都是呼吸机在滴滴报警,一半以上的病人氧饱和度都低于80%。”“那么多病人同时吸氧,是平时吸氧量的10倍!管道里百分之百的纯氧气,众多病人同时高强度吸氧,就显得不够分配了,好多病人的氧饱和度只有60至70,明显偏低。”“病房里,一位来自恩施的ICU护士,带着3位不是ICU专业的护士,照管着28位危重症病人,其中有一半以上的病人,生命随时都会逝去。”“在抢救第一个病人时,第二个病人心跳停止,在抢救第三个病人时,第四个病人心跳停止。那个晚上,又有四位病人不幸去世。”

这种惨烈的局面,作家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说真话,写出来,这能衬托出医者“用生命挽救生命”“与死神赛跑”的悲壮和艰难,也能显示出国家用不到三个月时间,取

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决定性成果的来之不易,更能让读者感受到,全国4万多医护驰援武汉,无一人受感染,是多么了不起的成绩!如果吞吞吐吐,躲躲闪闪,欲言又止,回避写惨烈,不敢写病毒肆虐的至暗时刻,那么,读者对悲壮和雄浑也就无法感受到。写疫情如此,写其他领域,同样如此,可以举一反三。

其二,要避免“有纪实,无文学”。现实题材纪实文学,是新闻和文学的融合,是迅速反映时代生活的“轻骑兵”,纪实文学只比新闻报道稍稍慢一点。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上海纪实》电子期刊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刊登了上海作家写的37篇原创抗疫纪实文学作品,不可谓不迅速。迅速,是优点,同时又是弱点,留给作者的思考和酝酿感情的时间少,这就要靠长期的积累和经验,靠作者艰苦深入的采访和写作时的感情融入。我的体会,现实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采访比写作艰难,采访认真扎实,掌握被写者的细节,写作时反而轻松自如。再以我写的《“最美的

哥”吴福强》为例,因为采访到大量生动细节,我在写作时,有意像说评话一样,从头到尾讲述吴师傅的人生故事,用细节表现人物和时代,不发一句评价,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得出结论。此文同样需要直面现实。因为此文涉及到高龄老人和重病人打车难问题,尤其是刮风下雨天打不到车。高尚善良的吴福强师傅,正是在这一点先感动了作者,继而感动了读者。

感情的融入之外,细节、语言、结构,这都涉及到文学性。文字尽可能简洁精炼也很重要。《包身工》《小木屋》都是1万余字的短篇纪实文学,却长久久在阅读流传。脍炙人口的《哥德巴赫猜想》,篇幅也不长。再说得远些,司马迁《史记》写了那么多精彩的真实事件,写了那么多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全书130篇,不过52万余字,古人在语言的精炼上,为我们后人做了很好的榜样。

解决了直面现实和“有纪实,无文学”两大瓶颈,现实题材纪实文学,前景必定光明。

是冰河,不是末日 ——疫情改变了我们的观影体验吗? ◆ 金涛

毫无疑问,世纪疫情对电影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数十个国际电影节被迫取消,数百部电影制作中断,数千个影视企业注销,数万家电影院歇业,从生产、推广到放映,全产业链的从业人员都感受了阵痛。有人担心,疫情过后,以影院为载体的观影消费方式会否经历大变局?

疫情是一场速冻的冰风暴,它对文旅行业的冲击,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打击流动。航空、旅游和所有倚靠流动性要素的行业都被深深撼动;二是减少聚集。演出、会展和赛事等所有强调聚集性特点的业态都被悄悄重塑。三是避免密闭。邮轮、影院和剧场等所有符合封闭条件的空间都被人人嫌弃。其中,邮轮因符合上述全部三个特性,将成为复苏时间最慢的产业,电影院作为人群聚集的密闭空间也深受其累,这是全球影业的冰河时代,但不是末日孤舰。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疫情期间,人们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的二律背反:短短三个月时间,有人观看的电影,超过了过去一年的总和。当然这些体验都是在云端进行的,与其是看电影,不如说是追剧。人类步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无论是音乐或是娱乐,都在朝着数字化、直播化、虚拟化转型,疫情加速了这一过程,但是无法改变电影院的根本属性,即公共空间。这是线下和线上观影方式最大的区别,也是电视至今无法取代电影的原因。况且,焕然一新的多厅电影院是都市商业综合体依附和青睐的对象,作为消费社会的经典场景,电影在引领文化消费方面的“赋魅”效应,不可忽视。

一是拟真。今天,尽管人们已经习惯在电脑上看电影,还是有大量

无论技术如何发展,电影院所代表的大银幕、黑匣子和集体观影,始终具有神秘的力量。电子消费社会中,人们越是被多屏隔离,越愿意被影院绑架,坠入黑暗空间;越是观影孤岛,越愿意迈出家门,回归同类,分享情感体验。这是亘古不变的人性。

的年轻观众涌进电影院,希望看到更多更拟真的世界。去年以来,4K修复版经典电影回归大银幕潮流,即是明证。看大电影好比赴一场视觉盛宴。超分辨率技术大幅提升了画面分辨率,历经岁月侵蚀的图像修复如初,尘封已久光影呈现原始的胶片质感,仿佛凝固了时光,为电影院带来了神奇的魔力,电影院捕捉细节、还原场景的“拟真”功能,引领了全球影院的技术升级,带动影院从2D迈向3D,从多厅迈向巨幕IMAX,从高清迈向超高清。未来VR和互动电影的结合,为电影发展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

二是离间。每到节日,返乡过年的小镇青年就会成为票房主力,看电影不仅是习惯,而是城市化生活方式。尽管很多人通过移动终端而非影院观看电影,不过这一趋势却伴随着一种持久的影院乡愁之情。电影的本质是白日梦,所有的影像叙事只为彼时造梦。这一特点在城市化进程中尤为明显。近年来,中国的二三线城市的银幕增长速度远高于一线城市,无论对小镇青年,还是城市白领,电影院对于

他们而言,除了满足一般的娱乐体验外,还是一个逃避现实压力的空间,一个情绪渲泄的出口,更是一个造梦托梦的场所。电影让观众暂时失去身份、地位和权力,营造平等观影的心理共享空间。

三是沉浸。所有表演艺术都有“黑匣子”的场效应。今天,人们喜欢成群结伴去电影院观看电影,在影迷们看来,这有一种脱离日常的仪式感。电影院天生所带来的沉浸感来自于其有特殊的“场”效应:黑暗环境抹平了观众之间的差异;密闭空间拉近了观众之间的距离;光影惊颤极易感染观众之间的情绪。粉丝文化的兴盛,使进影院看电影的行为超过对电影本身的体验,带来更多的认同功能,成了一种“打卡”,或者“还老爷子一张电影票”,观众消费和享受的是一种集体情感。

四是交换。电影院除了放映功能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为人们所忽视,即电影院还是重要的社交平台。每年,数干部电影的首映礼是电影院重要的吸引流量导入活动,全球一百多个电影节所带动“红地毯”效应,仍然持续推广和延续着电影文化,也间接证明,人们渴望的不仅仅是电影,而是去电影院观看电影的社交体验,电影院这个公共场所蕴含的大众文化价值,同样是观影行为背后的精神意义。

诚然,此次疫情对电影院提出了公共卫生安全的挑战,例如,密闭空间的新风系统、社交距离的座椅设置以及密集放映的场次消毒,等等。但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改良措施,不是灵魂革命。未来改变人们观影体验的一定是科技,不是病毒。

五四青年节,B站发布献给中国青年的宣言片《后浪》,引发迎面相撞的滚滚波涛。“爆赞”者“热泪滚滚”,而“看不下去”的人嘲讽是“一篇打鸡血的洗脑文”,还有更多默不出声端着手机吃瓜的——谁又能端出一盘人人叫好的菜。

现在中国的代际关系,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现今活着的三代人竟然分属三种不同的文明:爷爷奶奶是农业文明,爸爸妈妈是工业文明,儿女这一代是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讲使用价值,工业文明讲交换价值,后工业文明讲什么呢?这是全世界都没想明白的事儿,到处都是文化撞车的啾啾声。

这时节B站跑出来告诉“后浪”,“人类积攒了几千年的财富/所有的知识、见识、智慧和艺术/像是专门为你准备的礼物/科技繁荣、文化繁茂、城市繁华/现代文明的成果被层层打开/可以尽情地享用”——这是多大的一个坑!倘若汉武帝向年轻人这样说,那是受益无穷的澎湃激情,因为农业社会之后还是农业社会,父辈打下的盛世江山,后辈尽可能复制粘贴,安心“享用”。而今,“后浪”们面临的时代是多么陌生,全球化、数字化、类像化、城市化、中产化、夜经济、杀猪盘、996、断舍离、杠精、佛系……亚文化到N文化,二次元到N次元,既是“层层打开”,更是五色迷眼,谁能一语妙解?谁能微笑拈花?“后浪”们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行为方式、游戏规则、价值观念全部都要新建,那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前浪”能不能体会?

历史也是连续的,“前浪”莫大的功劳,是打造了国家工业化,创造了“后浪”前所未有的生活条件,而生活的内容是什么,“前浪”却无法开言。逼婚的讲不清什么是幸

福,督学的说不明学术独立是为什么,催人奋进却不知道思想的远方在哪里,一边给孩子讲哥伦布的故事一边期盼他未来生活在保险箱……太多的“前浪”不是浪,是原地打转的大漩涡,要孩子千秋万代不变样,可能吗?与其不可为而为之,何不放松心情,让“后浪”尽情去闯!

年轻人们将在筚路蓝缕中摸索,砍出一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前浪”没有解决那些应该解决的深层难题,都留给了“后浪”去承担,“前浪”没有尝试的那些“错”,“后浪”只能以更大的“错”去付出。

人人都曾“后浪”过,翻开几十年前的摄影作品,那些青年的面容多么真纯,多么苍茫。那张《布鲁克林帮》,摄影师戴维森拍于1959年。那年他25岁,混入纽约布鲁克林的一群年轻“黑帮”中,拍下一组系列照片。一个黎明,在桥边狂欢通宵的年轻人坐地铁回家。“黑帮”的头儿撩起袖子查看手臂,他16岁的女友对镜整理,看西米亚画风别样美丽。20年后,戴维森又找到了这一对恋人,他们早已结婚,女儿正好也16岁,谈起往日,他们无悔,脸上又现年少轻狂的笑颜。

1990年代初,几近不惑之年的王小波狂热写作,但直到1997年他猝然病逝,寂寞加着贫穷,始终伴随着他的年月。有不少人劝他转变风向,适应一下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大众品味,但他痴心不改:“你必须按所想去生活,否则你只能按生活去想。”诗意的跋涉啊,活出了泰然处之,活出了灵魂和天空。精神漫游的年华才会“心里有火”,山重水复的青春才能“眼里有光”,被划定的生存虽然温暖,却没有打开的生命。年轻的“后浪”不需要“在童年就进入了不惑之年”,带着疑惑去探路,是新一代的天高地广!

致后浪们的天高地广

◆ 梁永安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